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牙舟陶器烧制技艺

贵州牙舟陶

牙舟陶的文化价值及产业化历程

杨俊 杨正勇 著



四川美术出版社

贵州省省长基金项目

贵州牙舟陶

牙舟陶的文化价值及产业化历程

杨俊 杨正勇/著

中共黔南州委宣传部 资助出版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四川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牙舟陶 / 杨俊, 杨正勇主编. -- 成都 :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410-6056-4

I. ①贵… II. ①杨… ②杨… III. ①陶瓷艺术—平塘县
IV. ①J5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2286号

贵州牙舟陶

GUIZHOU YAZHOUTAO

杨 俊 杨正勇 著

出 品 人：马晓峰

科学顾问：王小灵

责任编辑：陈 晶 肖 洁

校 对：顾嘉蓉

封面设计：王科本 朱村辉

摄 影：杨 俊 周 庆 谢泰春 俞杰宝

出版发行：四川美术出版社

地 址：四川省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610071）

制 作：成都市墨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四川新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280mm×280mm

印 张：17

字 数：360千

图 幅：175幅

版 次：2014年8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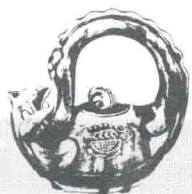
印 次：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10-6056-4

定 价：320.00元

■ 著作权所有 违者必究
■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贵州牙舟陶



CONTENTS

目 录

序 万千风姿本是泥	/ 005	窑之忆	/ 059
牙舟陶的文化价值及产业化历程	/ 008	泥之味	/ 060
序篇 山野陶乡	/ 011	釉之色	/ 086
上篇 古陶之风	/ 019	火之魂	/ 108
中篇 史陶之源	/ 031	艺之功	/ 140
下篇 名陶今生	/ 047	陶之缘	/ 196
跋篇 永远的思考	/ 051		

贵州省省长基金项目

贵州牙舟陶

牙舟陶的文化价值及产业化历程

杨俊 杨正勇/著

中共黔南州委宣传部 资助出版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四川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牙舟陶 / 杨俊, 杨正勇主编. -- 成都 :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410-6056-4

I. ①贵… II. ①杨… ②杨… III. ①陶瓷艺术—平塘县
IV. ①J5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72286号

贵州牙舟陶

GUIZHOU YAZHOUTAO

杨 俊 杨正勇 著

出 品 人：马晓峰

科学顾问：王小灵

责任编辑：陈 晶 肖 洁

校 对：顾嘉蓉

封面设计：王科本 朱村辉

摄 影：杨 俊 周 庆 谢泰春 俞杰宝

出版发行：四川美术出版社

地 址：四川省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610071）

制 作：成都市墨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四川新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280mm×280mm

印 张：17

字 数：360千

图 幅：175幅

版 次：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10-6056-4

定 价：32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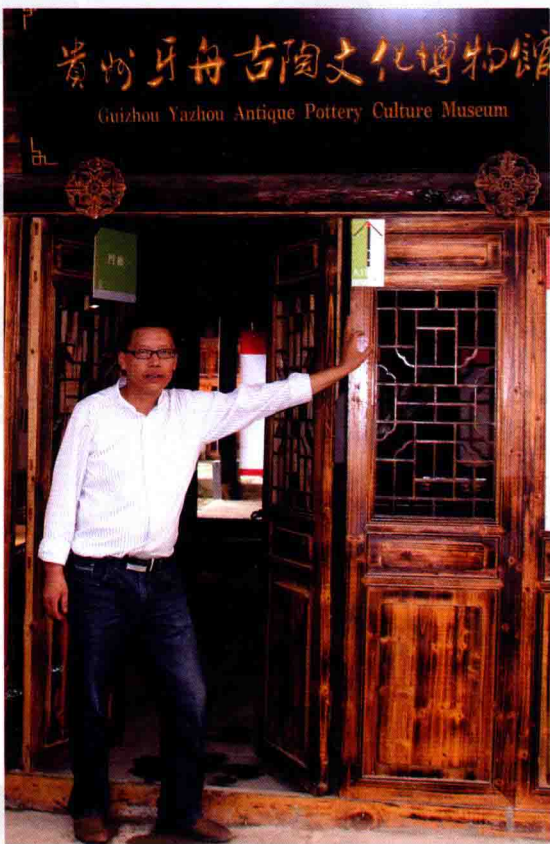
■ 著作权所有 违者必究
■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杨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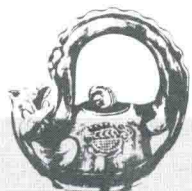
贵州省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学术带头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贵州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主席团成员，贵州省陶瓷协会副会长，贵州省艺术科学学会理事，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理事，民进贵州开明画院院长，中国国家画院张志民工作室画家，黔南州美术家协会主席。现任民进黔南州委主委，黔南州政协副主席。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项目、贵州省省长基金项目的工作。著有《贵州水族艺术研究》、《水族墓葬石雕》。



杨正勇

现就职于贵州省平塘县教育局。已过不惑。三尺讲台上站了十三年，挎着相机跑新闻四年，背着行囊在贵州的山间水畔做田野调查四年，累了，懵了，曾断断续续地跑去大学面壁四年，二十五年的工作简历就这样满了。做过什么，做了什么，说得清楚，却拿不出手。著有《生于平塘》，与人合著有《苗侗之乡：黔东南文化考察》、《龙行贵州》、《榕江：山水相伴的家园》。

贵州牙舟陶



CONTENTS

目 录

序 万千风姿本是泥	/ 005	窑之忆	/ 059
牙舟陶的文化价值及产业化历程	/ 008	泥之味	/ 060
序篇 山野陶乡	/ 011	釉之色	/ 086
上篇 古陶之风	/ 019	火之魂	/ 108
中篇 史陶之源	/ 031	艺之功	/ 140
下篇 名陶今生	/ 047	陶之缘	/ 196
跋篇 永远的思考	/ 051		

序 | 万千风姿本是泥

本书是一个课题的研究成果。关于此课题，我们曾明确提出主要着眼于“平塘牙舟陶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生产发展模式”，并侧重从“民间工艺审美、材料加工与工艺制作、传承方式、产业化形成”等诸多问题进行探讨。但大家翻开眼前的这本书，相信定会明显地感觉到，文本的表述似乎有些偏离了传统学术研究的“严谨、严密、严肃”。个中的原因，是我们“遭遇”了超出预期的设想与判断：对象不是僵硬地等着我们去“解剖”，而是带着历史的沉思和现实的隐忧与我们面对面地交流、对话。于是，我们的故事不得不从这里开始：它从几百上千年的时间隧道里穿越而来，但身后的身影依然清晰，前行的脚步也还是那样执著；它也曾高居堂皇冠冕的艺术殿堂，但却更多与广泛民间普通大众席地把盏；其雍容典雅的绿釉品质，老百姓说“这才是真正的牙舟陶”，业界则谓之“独树一帜”。

众说纷纭，是因为牙舟陶确实有说头。然见仁见智，或零星捡起一鳞半爪，或刨根究底寻到一些根由，因为出发点不同和目的差异，有的人就把它的故事当作传说，有的人则把它的传说当作历史……深陷在牙舟陶的“百面人生”中，我们所要做的，便是本着学术的良知，努力“还原”一些真相——至少是大多数人可以接受和认可的身份影像。

但是谈何容易！

首先是应该把牙舟陶放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诚如大家所知道的，牙舟陶固然是一具以产地命名的陶器品种，但这并不意味着小小的牙舟就负载了它的全部内涵。它生于牙舟，牙舟是它的“家”，但牙舟却不能代表或浓缩一个纷繁的“社会场景”。另一方面，牙舟陶也并不是以某一尊孤立的个体造型引得世人侧目以盼。它的被世人关注，源于一个个时空变幻的“舞台”，这个“舞台”的下面，有山野村民朴实的需求眼光，有陶艺家专业、挑剔的审视，有鉴赏家精挑细选的捕捉……聚焦一束光投影在它的后面，确实很难说清楚哪一幅画面最能衬托出它的本味。

其次是牙舟陶是否有一个明确的身份？在牙舟陶发展的路上，一句“日用陶美术化，美术陶日用化”开始模糊了艺人和艺术大师的区别。是的，牙舟陶有其可以追溯久远、朴素的渊源；却也不能否认，它的日渐声名鹊起，相当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众多艺术大师的包装。李立新先生有一句话如是说：“艺人们和纯粹艺术家不同的是他们在制作他们的工艺品时，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它的作品会有什么样的艺术价值，而首先考虑的是他的作品做出来后会对他的接收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人们是否愿意出钱购买它。”小小的牙

舟陶，一头挑着牛羊下山鸡栖于埭的情调，一头挂着阳春白雪的艳丽风姿，哪头轻哪头重，恐怕谁也掂量不出它确切的斤两。

说不清楚于是索性缄默其口，老老实实地把走进田野的所见所闻不加修饰地记录下来。于是书里便自觉地飘出了好多充满泥土芬芳的“野性文化”味道：取之不尽的陶泥是神龟铸就的，陶器的制作技艺是王母娘娘下诏传给人间，捏塑造型的灵感来自顽皮的孩童，最好的陶窑得益于“上有青蛙，下有菩萨”的护佑……想想，这民间的根确乎扎得很深！

不期竟然还粘上丁点学术的味——而这味一经发酵，那酵母里却全是洋洋洒洒的文化典范：原来牙舟陶的家庭作坊生产与“家传”形式竟然与世界上众多古老陶技传承同出一辙，随性而自在的浪漫想像不仅可以从山间遍地的花草树木中获得灵感，也可从山民们服饰上的点缀借鉴，还能从远古过去遗失的锅碗瓢盆加以演变——或有人说，它的演变，拉开的恰恰是一幅西南山地农村漫长的生活画卷……陶本陶，泥是泥，人乃人，而这陶与泥、陶与人之间因为某种因由结上了缘，附上了心智、心性，有幸端坐在艺术冠冕的殿堂上，竟然也可以口若悬河地讲述许多艰涩深奥的“理论”。

见仁见智，追根溯源求本真也罢，扬名立世展未来也罢。2008年，牙舟陶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陶器烧制技艺类”名录，也算是为自己的前世今生写下一段完满的注解。于是，许多的置疑、猜测、争议、论断，自然而然进入乡野农家的“龙门阵”，当然也充满悬疑地进入众多探究者的视野。

但，真相不是诱惑。

真相，承载着对历史负责的书写。

话说1958年“大跃进”时期，当地村民为修建大食堂，在陶瓷厂附近砍倒一棵三人合抱的枫香树，挖开树根，发现根底有陶窑遗址一座，并出土了一批彩陶碎片。据估计，古树树龄约500年，树下的陶窑当然更早；据在陶瓷厂附近发现有开采过陶土的多处洞穴容量推算，已取用的陶土可供制陶500年以上；当地布依族及多数汉族居民都说他们的祖先来自江西——环环推演，牙舟陶当兴于明朝洪武年间，由匠人从江西带来……

牙舟陶的故事似乎应该从这儿说起：因为它确乎被大多数人有板有眼地津津乐道。

似乎这个故事并不是由牙舟亲自讲述！

不期有一位叫童恩正的先生，极其谨慎地说道，当代考古学证明，在史前时期，西南地区不但不是落后的，而且可能是东亚古文明的中心之一。它不但可能是人类的发源地，在旧石器时代保持了一种与欧洲、非洲不同的文化传统，而且即使到了新石器时代，其发展的水平并不低。如此看来，既已走在“时

代”前列，又何须千里之遥从他处“借来”？在那个舟楫匮乏的年代，牙舟陶纵然有心恐怕也无力从跬步皆山的贵州恰恰寻到牙舟这一落脚处。

一般认为，陶器是在人们定居下来并形成村落后才出现，因为游荡不定的人群无法使用陶器，而定居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大量的考古又说了，就目前书籍材料而言，将中国南方作为栽培水稻的起源地，是可以成立的。如果说牙舟陶本生于牙舟，好像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以此为中心，北距牙舟镇不过200余公里的安顺平坝飞虎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先后出土陶片近2000件，发现了贵州高原原始文化的第一片彩陶；黔西北威宁中河乡、黔中省长顺县广顺镇神仙洞遗址、在黔西南观音洞遗址、遵义桐梓马鞍山遗址中，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陶片、陶饰品等。西南面的四川、云南等地，更是出现了有名的大溪文化陶器、大墩子文化陶器等……考古，是让沉埋几千上万年的遗留“说话”，而一言九鼎的“话”早已阻断了后人“信”与“不信”的选择。

末了，更有国内外的陶史专家异口同声地说，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制陶完全可能由不同地区的原始先民在各自生产、生活实践中发现、发明，而不一定需要其他地方人群的传授与教导……

故事，当然需要世代相传；越是散布越广的故事，“根”一定要吸足历史的养分、学术的养分、民间的养分。

如此，注定了牙舟陶本身只能是一个“传说”。

或曰：从始于原始时代的捏塑成型，至源于距今5000年左右的陶轮制坯，直到现代的注浆成型，牙舟陶的制作不仅步步经历，而且还完好地保留着远古的遗存。

或曰：从选料到成型、装饰、施釉、烧成，牙舟陶全然沿袭着传统的工艺流程。古老的小龙窑、阶梯窑里，至今还在讲述着因“寒火”和“惊风”而演绎的“窑变”与“冰裂”传奇……

——而哪怕仅仅只是一鳞半爪，我们从田野里捡起了，便获得了一份沉甸甸的“真实”。把这份“真实”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亦即是本课题“研究”的初衷。因为再饱满甜蜜的甘蔗，被嚼过了一次，第二次，无论你怎么渴望，也都是渣了！

代为序，诚与诸君共勉，并祈盼得到方家指教！

作者自序

2014年6月于贵州黔南

牙舟陶的文化价值及产业化历程

对于陶瓷，世界知名人类学家J. E. 利普斯在其最富盛名的《事物的起源》一书中如是赞道：“制陶术的最高峰是瓷器的发明，这是文化发达的中国人给人类物质财富增添的另一件礼物”、“直至今日，中国瓷器大约仍是世界上最有价值之物。瓷器使各个时期权势者的桌子上增添光彩”。美国文化史专家威尔·杜兰特更是在他耗时四十余年写就的《世界文明史》中满怀崇敬地写道：“如今我们对于中国的陶（瓷）器只能怀着无限的回忆，它们就像中世纪的彩色玻璃一样，将永远不可能再回来。欧洲的陶工虽然全力以赴，但所制陶（瓷）器仍然赶不上中国陶（瓷）器的精细。收藏家们年年以不同的价格收购现存的中国名瓷，500美元买一个茶杯、2.36万美元买一个山麓花瓶。一对1767年的‘吠狗’瓷器的价钱，高出雷尼的《耶稣的婴儿》画像5倍，也高出拉斐尔的《圣家》一画3倍之多。但是只要人们看到、摸过和用心灵去感受那可贵的中国陶（瓷）器，他将会对这些价钱不屑一顾，而认为此实为亵渎之举，它不是世界上任何美丽的东西和任何高价的金钱可以比拟的，即使它被高价买了去，仍无损其美丽的地位。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的陶（瓷）器是中国文明的高峰和象征，中国陶（瓷）器是人类所能做的最高品质的东西之一”。

事实也即是如此。著名文化学者程金城曾这样论说中国陶瓷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泱泱中华古国的昌盛形象，最先就是以瓷为媒介向世界展示的，以至于英文“china”（瓷器）成为中国的象征和代名词。

远在南宋之期，当朝政府大力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积极推进中国出口商品从丝绸向陶瓷的经济转型，南宋经济一度空前繁荣。据统计，仅泉州港，一年出口收入就达200贯，相当于北宋时全国的年财政收入。大量陶瓷器物的出口，进一步增强了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最伟大的英国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1564年—1616年）之《仲夏夜之梦》舞台演出中有这样一段场景：

舞台上一片漆黑，有人在上面独舞。接着交响乐响起，突然间灯光大亮，舞台上清晰出现一个中国花园，有建筑、树木、植物、水果、飞鸟、走兽……

在这如画的景色里，中国恋人唱着普赛尔优美的二重唱，六只猴子从树木中现身跳舞，舞台上此时进入最高潮：

六个中国风味的基座从舞台下升起，上面放着六个巨大的瓷盆，中间种着六棵中国橘子树……

如果说这只是一种文学的表现，那么现实的影响实际上远远超出了最具浪漫情怀的作家们的想象：18

世纪，整个欧洲突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中国文化热”。尤其在法国，路易十五甚至下诏废弃原有的银制用品，从宫廷到民间日常生活用具全部改为中国瓷器。瑞典更是举国上下以中国风俗为时髦，日常生活器具全部改为水壶、水罐等。

一言以概之，中国风格的事物最吸引西方人眼球的，之所以是陶瓷这一看似简单的造物，一在于它根生于古老的文化土壤，二在于它呈现了远古的文明形态，三在于它始终顺应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并传承与创新。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陶器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是中国远古先民的重大发明，是继石器出现后最重要和最丰富的文化遗存。赵汝珍等坦言：“中国制造之品，惟陶法发明最早。神农始作瓦器，见于《周书》；尧舜循行东夷，改良陶法，夏用昆吾造屋；周礼重陶法而设官；秦则有缶量；汉则有砖瓦；列国有器具；六朝有土俑；隋唐则有佛像及杂物；至五代之末，瓷器发明，而陶法遂浸进步矣。历宋迄清，相沿未改，此古陶源流之大概也。”“考陶器之兴，远在人类进于文明之前。在野蛮时代，即能制陶……其后因文明之进展，陶器制造代有进步。唐虞三代，以迄秦汉，无不以陶器为民生要事……”由是如此，所以程金城先生才不甚感慨：“彩陶可以说是综合着数千年原始社会状况、人的生存情境和浓缩着精神世界的一本独特的‘史书’。”就中国彩陶而言，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以前最重要的艺术创造，而且其本身从产生到衰落的历史也超过了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

然而也正是由于名声在外，世人对于中国陶瓷的关注，多聚焦于马家窑、大汶口、龙山岗、大溪、河姆渡、良渚等文化遗址的陶器；多聚焦于河南汴京官窑、江西景德镇窑、南宋官窑与哥窑、福建泉州窑等官窑、名窑的出产产品，殊不知，在一些隐秘的大山深处，一些并不起眼的民间陶窑，却一直在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传承着中国制陶技术，昭显着中国陶瓷演变和发展的历程。深居贵州黔南南缘山地的牙舟陶便是其中的典例。那一段旷古的历史，虽然鲜有汉文典籍的记载，但在当地人的传说中，在那些已经陈旧的陶器上，依然熠熠生辉地闪烁着人类文明的光芒。更为主要的，因为牙舟陶一直隐埋于“民间”，较单纯地与乡土结缘，作为最普通、最实用的人类生产和生活用具，以其不可替代的特性适应着人类恒定而又广泛的种种需要，长期与人相伴，与人之历史相伴。



序篇 | 山野陶乡

对于文化的研究，地理环境及其背景的分析始终是一个避不开的节点。

放大了讲，这个地理环境可以是人类生存的地球。它之于人类文化的意义在于，“认识地球，并不在认识自然的、生物的和人文的等一系列现象的某一单独现象，而在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它们相互间产生的组合。因为这些组合，形成了我们所感受到的地球表面上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状况……”地球这个“家”，“不但是我们人类居住之所——我们从它那里发源，它又给我们以生存和繁衍后代的生活资料”；更重要的是，它并不单纯是经济活动的舞台，它亦是“一个美丽和有趣之事物”，蓄积着它是“如何建成的，它的风景和它的天空类型又意味着什么”等信息。借用美国地理学家哈特向的话说，“地球上的要素，对不同文化或不同时期的民族，或同一时期同一文化下不同的集体和个人都具有不同的意义”。

微缩了说，具体到某一区域甚至是单一的村寨，我们所称的“自然环境”，只能用居民的认识和愿望来体会，而“自然资源”实际上是文化上的估价。

因此，对于牙舟陶研究，不管是把它放置在技艺研究的层面，还是立足于文化探讨的视角，其生存的“环境”，首先是构成牙舟陶文化系统的基石。而这块基石经历了上亿年的地质历史沉淀和上千年的人文演绎，已经成为牙舟陶生命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甚至说，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命脉。

第一章 地理的生成

不同于江苏宜兴紫砂陶、云南傣族慢轮陶、青海囊谦黑陶等名陶，也不同于贵州省内雷山灰陶、余庆绿陶和黑陶、织金沙陶、威宁白陶、贞丰黑陶、赤水红陶等，这些陶，或以质地，或以制作器具，或以色泽命名，而“牙舟陶”，则是一个较少以其生产地命名的陶器产品之一。

牙舟者，今为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下辖的一个镇级行政单位，位于县境中部，地处东经107° 03′ —107° 12′，北纬25° 43′ —26° 01′ 之间，东邻白龙乡、卡罗乡，南抵摆茹镇、西凉乡，北至谷硐乡、掌布镇，西连大塘镇、通山镇。镇政府所在地长寨村距县城26公里，距省会贵阳市157公里。省道320公路穿境而过。全镇辖14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共4641户，其中少数民族（布依族、苗族）人口占全镇总人口数的34%。

孤立地审视这段关于牙舟地理的描述，内在的信息确实很单薄。但如果我们把它放置在“绿色喀斯特王国”的国际地学背景下，则可窥探到这一地理生成的特殊性。

世界喀斯特地貌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地中海沿岸、拉丁美洲、中国的华南地区。论分布面积，中国华南喀斯特地区最广，包括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和云南的一部分，而其核心区就在贵州。

作为中国最大的一片喀斯特分布区，贵州喀斯特地貌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73.3%。从黔南的荔波、罗甸，延伸到中部的贵阳，直至黔西南的兴义，是一片聚集了成千上万座峰林的椎状喀斯特地貌。贵州的许多县市、集镇、村寨，就隐藏在这茫茫群山、葳蕤峰峦之中。大山之中隐藏千百年，其间的隐秘也少为世人知晓。于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成了贵州“溪峒社会”特有的显徵。其间生活的人们，不仅在这片山地上创造了远古的文明，更在其间诞生了让人惊讶的生存智慧——牙舟人的靠“陶”吃“陶”，竟然“吃”出一段旷古的制陶文明史。

靠“陶”吃“陶”，陶泥是根本，是制陶的先决条件。但不是所有的粘土都能制陶，粘土有很强的地域性，不同地区土质中所含有的矿物质和化学成分不同，成型的要求、烧结后的质地、颜色、坯体与釉层的吸附程度、烧结温度都会有很大差异，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所生产的陶器的质量和风格。

牙舟镇境内地势属山峡谷地区，沟谷纵横，地表破碎，无大坝地；地面起伏较大，海拔690米—1110米，相对落差200米—400米。站在新寨坡顶瞭望，牙舟镇政府所在地四周布排着严严实实的山，王家山、大韦

山、阁上坡、白岩坡、鸡狗屎坡……叫得出名的叫不出名的，一座挨着一座，自然地围成一个密实的山间盆地。这些山，多为石灰岩溶蚀中低山，山上，遍生着富含硅质和铝质的石头。石头历经旷日持久的风化蚀变和长年累月的雨水冲刷，点点流淌到山脚，浸漫到“盆地”底部，日积月累沉积下来，最终形成一片硅铝成分较为丰富的优质白泥土层，当地人俗称“白胶泥”。这种泥取用方便，几乎无沙砾杂质，粘性强，可塑性高，质地细腻，基本不用炼土，比效耐火，经1000度左右的高温后陶质变得非常坚硬，这是作为生活日用品的陶器所必备的首要特性。据有关论证，“白胶泥”以硅质岩屑云母土为主，为第四纪坡积矿床，内含丰富的氧化硅、氧化铝和大量的铁质离子，适合于烧制工艺陶和日用陶器。

民间传说中，牙舟的陶泥是有“神性”的。年近80岁的本土学人熊金尧先生把它归结为“神龟铸陶泥”。话说有一位仙翁，手持赶山鞭自南海赶着一片大山北上，行经牙舟时，遇上一汪深水，大山便自动分成两列沿岸行走。仙翁见深水碧绿清幽，清澈如镜，青山倒映，氤氲萦绕，宛若仙境，于是一声“立定”让大山止步，并放下一只庞大的乌龟潜入水中，然后将赶山鞭化作一羽白扇，驾驰而去。由于水质良好，气温适宜，乌龟越长越大。千百年后，乌龟背露出水面十余丈高。龟大池小，乌龟不能翻身调头，便蹬动四脚，将池底蹬穿，池水渗入地下，便留下了这“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陶泥……

走出神话，牙舟陶泥的生成似乎更与这片地域地质历史的演变息息相关。据说，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牙舟陶器厂工人在开采陶泥时，于陶洞内掘到一棵直径约45厘米的树干，附在树干上的陶泥表面，还保留着树叶状的印纹。从洞中取出树枝点燃，如蚊香，没有火焰，散发出阵阵别异的香味。越往下开掘，泥层下的泥沙和鹅卵石中，不时有地下水冒出。牙舟中学教师刘廷贵先生据此推测，在很久以前，这里可能是一片水陆相接的原始森林，并赋诗云：“森林地陷水云间，古树江流尘土淹。理化熔合生万象，自成体系隐千年。”

查贵州地质演变史可知，大约在14亿年前，今贵州所属大部分土地浸泡在西部特提斯海和东部与太平洋交接的浩淼烟波中。距今约9亿年时，“原特提斯”海形成；到了距今3.5亿—2亿年之间，南北两块陆地拼接在一起，“原特提斯”海渐渐消失，孕育出新的大洋“古特提斯”；距今1.8亿年时，“古特提斯”海渐渐消亡，“新特提斯”开始在欧亚大陆的南缘呼啸奔腾。伴随着特提斯海洋的三次生长消亡，这片地域先后经历了武陵旋回、雪峰运动、地底“软流圈”升温、燕山—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等共计18次升降和3次褶皱运动，让贵州在海与陆的迭变中

不断沉积，直到距今2亿年左右，终于脱离海浸的历史；距今3750万年时，完成贵州骨架的定格。牙舟地质历史的形成，是否与贵州地质系列运动同步，或者只是细微的波及，都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索，陶泥可能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佐证。

占“地利”还得“天时”。牙舟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类型，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热量充足。温暖中夏旱区的气候，最冷月平均气温4.8℃—7.0℃，最热月平均气温23.5℃—25.6℃，年平均气温15.1℃—17.2℃，年总积温5500℃—6280℃；无霜期282天—313天，年降水量1200毫米—1400毫米。这种气候，保证了制陶业很少受到气候影响，一年四季都可做陶。以前牙舟制陶者一过正月十五就开始做陶，一直做到腊月止。

另一方面，这种气候环境，特别适宜亚热带暖温带多种植物生长，从而使得四周的山上形成了大片以松科、壳斗科、樟科、玄参科和金缕梅科的麻栎、白栎、栓皮栎、樟楠、泡桐、枫香等阔叶林为主的天然森林资源，客观上为牙舟陶的烧制提供了充足的燃料。

陶艺的制作讲究“一柴二泥三窑匠”。三者皆备，牙舟陶生于此间，自然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第二章 历史的附会

用当下的行政区划来锁定牙舟的历史身份，也许不能确切地显现其固有的“时代背景”，但至少它能在一个区域范围内为我们界定一个大体的“轮廓”。

追溯历史，结合今之学者对夜郎疆域界限的推拟，或夜郎“东接且兰，似即以流经今镇宁、关岭之打帮河和流经今紫云、罗甸之涟江（蒙江）与且兰分界；南邻句町，即以今黔、桂边境之南盘江为界；西连漏卧，即以今滇、黔边境之块泽河黄泥河为界；北至敝邑（即今贵州黔西、金沙一带，或说在今遵义），应即以今乌江南源之三岔河为界”；或“夜郎本土的地域，大体包括今黔西南州、六盘水市、安顺地区西部和黔南州东部的部分地区”；或夜郎联盟群体控制的地域，以现有行政区划而言，主要有“贵州除东北角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云南东部的文山州全部，红河州的金平、屏边，曲靖地区的富源、罗平、师宗、泸西、弥勒；广西西部河池地区的南丹、天峨；百色地区的凌云、田林、那坡、西林、隆林。今贵州全省土地面积为17万余平方公里，除去极小部分不在此中的地方，加以滇、桂的这些较广地带，夜郎联盟群体控制的

地区当有20余万平方公里”。在此，我们姑且不管学界的争议最终将如何定论，今天隶属平塘县域的牙舟镇都不可置疑地被圈定在夜郎这个兴于战国毁于汉代的地方政权辖治内。综合相关史料，可理出一条基本的轮廓——

春秋时期，平塘地区为毋斂属地。以后牂牁国兴起，平塘地区为牂牁属地。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221年），夜郎取代牂牁，平塘地区为夜郎属地。

秦嬴政三十三年，置桂林、象、南海三郡。平塘地区属象郡。

汉代，平塘地区东部属毋斂县。汉元封五年，平塘地区属益州牂牁郡。

新莽建国、蜀汉后主建兴、晋代、南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任凭朝代迭替，平塘地区一度延续东部属毋斂县、西部属谈指县的区域规划。

隋代，平塘地区属牂牁郡宾化县。

唐初，平塘地区置两个羁縻州，即南平州（后来的平州、平舟）和动（一作勐）州，即今之通州。平塘地区内单独设置地方政府始于此。

五代晋高祖天福五年，都匀酋长尹怀昌率其十二部归顺楚王马希范。平塘地区为马希范辖地。

宋太宗至道三年，平塘地区置沿袭动（勐）州和南平州。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所置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新添葛麻安抚司、庆远南丹溪洞等处军民安抚司三个行政区在平塘皆有领地。

明置贵州宣慰司，贵州成为相当于省一级的政区，设贵州卫，辖金筑、程番等十六长官司，其中大龙番、小龙番、方番、卢番、韦番、卧龙番、程番、罗番等八番长官司皆有领地在平塘地区。

清顺治十五年（1667年），清军进入贵州。实行改土归流，取消土司制，地方由流官治理……

在并不富集的地方志书上，与牙舟相关的史实并不多，记述也相对分散：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划全国为一个中书省，十一个行中书省，贵州分属四川、湖广、云南三个行省，并先后置有八个相当于路一级的行政区。其中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新添葛麻安抚司、庆远南丹溪洞等处军民安抚司三个行政区在平塘皆有领地。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建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辖一个宣慰司、三个府、九个安抚司、三个长官司。其中管番民总管府所辖五十三个蛮夷军民长官司中的重州蛮夷军民长官司设在通州，六洞柔远等处蛮夷长官司设在六洞，丹竹蛮夷长官司设在牙舟……

清顺治十五年（1667年），清军进入贵州，大兴改土归流，取消土司制，地方由流官治理，划平舟长官司属都匀府，牙舟把总隶平舟长官司。

雍正八年（1730年），撤平州、丹平、丹竹三长官司，平舟司改设土把总一员，隶属都匀府。